

脫離福利能否走出貧窮？ 兼論社會救助制度的作用

杜慈容

壹、前言

母改嫁有錢 兒低收入戶沒了

就讀技術學院的 A 同學，原賴半工半讀和低收入戶補助維生。因離婚改嫁多年的生母被查出有動產，致低收入戶資格遭取消，面臨繳不出 5 萬多元學費的窘境，市議員許淑華等人昨天抨擊法令僵化，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反成為弱勢族群的殺手。（詹三源，2009 年 3 月 3 日，聯合報）

每年度低收入戶資格總清查後，總有人因各式原因離開福利體系，其中有些人在接獲通知後會採取各式手段要求重新審查，試圖突破社會救助法的規定以重返救助體系，這恰和主管單位戮力促其脫貧的期盼背道而馳。這要單純的歸咎於是低收入戶的福利依賴，還是現行社會救助制度或哪裡根本上出了問題？再者，更需省思的是到底何謂「脫貧」？能說他們離開救助就真自立了嗎？社會救助被視為是社會

安全制度的最後一道防線，從他們進入到離開福利體系的歷程中，到底作了什麼？對他們要應付及脫離貧窮來說，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

貳、貧窮與脫貧

一、貧窮

傳統上，對於貧窮的定義有「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兩種取向，另外亦有學者提出能力、精神等「非物質貧窮」。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主要是基於「僅足生存」（subsistence）的概念，亦即最低生活水平的維持，是一種客觀的衡量；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較絕對貧窮主觀，係指貧窮者雖能維持生存，但與特定時期內一般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較，仍是處於較低的生活水準（周麗芳，2003；黃洪，2013）。臺灣法定的貧窮是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

分之六十定之（全國法規資料庫，2013）。在相對貧窮中，Townsend（1979）認為貧窮包含相對匱乏（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不僅包含基本需求，還有社會性需求、社會參與等非經濟、更廣泛的意涵。此外，Sen（1983）提倡「能力取向（capability approach）」的觀點，貧窮還有能力、精神等非物質的考量。貧窮不是所得的不足，而是一種能力的剝奪。而孫健忠（2000）認為，廣義而言貧窮不僅具有物質（經濟）上的意義，也應包含精神（心靈）上的意義。然而此二者之間並無必然的存在關係，亦即物質的貧窮不必然會產生精神的貧窮，而精神的貧窮也不必然導因於物質的貧窮。

二、脫貧

按字面解，若將其視為是「脫離貧窮」的簡稱，則脫貧的定義就和如何界定貧窮有關。如前所述，目前各界關於貧窮概念的界定不一，可以是絕對貧窮或相對貧窮的觀點，也可以僅關注經濟層面或擴大到非物質層次。參採 Bradshaw（1972）社會需要理論的概念，可以是政府或國際組織所定客觀貧窮線的規範需求（normative need）；也可是來自窮人自身對貧窮主觀認知的感覺需求（felt need）；或是透過行動（如記者會）訴諸於外的表達需求（expressive need）及和其他人相比產生相對剝奪感的比較需求（comparative need）。第一類貧窮線的界定最為狹義、具體，以此來看，脫貧可看作是脫離官方貧窮線或資產標準，依法不得再接受政府的補助，

是一種單一、經濟取向的結果論。目前關於貧窮動態的相關研究，論到脫貧多是採取此種定義，意指離開救助體系（陳正峰，1998；Bane & Ellwood, 1986）。而後三類的標準則更為廣泛和抽樣。廣義地說，若如 Townsend（1979）把貧窮視為是多面向的生活機會不足，則脫貧就指涉在多層面的提升。Sen（1993）將貧窮視為是種能力的剝奪，因應之道即在於能力的建立。檢視國內貧窮動態相關研究，其所意旨的「脫貧」，係指離開公部門的社會救助體系（王仕圖，2001；王德睦等，2000；孫康華，1998；陳正峰，1998；蘇淑貞，1997），或不再接受民間單位經濟扶助（林正達，2005；蔡晴晴，2002；鄭淑文，2006）。可見上述研究是採狹義的脫貧定義。另外，周大堯（2006）在探討脫貧婦女的復原力建構歷程時，將脫貧界定是在經濟方面達到脫離貧窮之意，是種經濟面向的脫貧定義。而王崧任（2011）在進行青年脫貧歷程之研究時，將脫貧定位為能工作自立。換言之，現有研究對脫貧的界定，多聚焦在脫離救助，少數提及經濟、工作層面，整體說仍缺乏其他多元層面的討論。

綜上，筆者認為貧窮與脫貧兩個相連的概念都有狹義與廣義的定義。狹義的貧窮是指官方用來判定低收入資格的資產審查標準，基此，狹義的脫貧可視為脫離官方定義的貧窮，等同於脫離「低收入戶」福利。而廣義的貧窮，是指除經濟層次外，更包含非經濟層次；因此，廣義的脫貧，則是在脫離福利、經濟自立之外，也包含非經濟面向的考量。簡言之，狹義的貧窮

和脫貧可以福利身份的轉換來測量，而廣義的貧窮和脫貧，在界定上更為困難，是

種相對主觀的認定。

定義\概念	貧窮	脫貧
狹義（官方）	進入福利	脫離福利
廣義（主觀）	經濟匱乏 非經濟：被社會排斥	經濟不匱乏 非經濟：可融入社會

參、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探索低收入戶家庭如何主觀詮釋其脫貧經驗，並從政府社會救助相關人員的視角，來理解他們如何看待貧窮、窮人與社會救助制度，進而分析國家社會救助制度在低收入戶家庭能否脫貧過程中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研究立基建構主義的研究典範，採取質性研究取向，透過深度訪談法及文獻分析法蒐集資料，並以主題分析法來分析。在分析框架，結合貧窮歷程「進入、持續與脫離」的時間面向，以及「微觀、中觀及宏觀」的層次面向，並以社會排斥理論作為主要對話的理論。在訪談對象上，總共訪談了臺北市 14 個低收入戶家庭，他們都曾進入低收入戶社會救助體系，停留短（4 年以下）、中（4-8 年）、長（8 年以上）期不等的時間，其中 8 個已離開，6 個離開後又重返社會救助體系，現在仍是低收入戶。另外，也訪談了 15 位工作者，涵蓋基層社會行政人員 3 位、複審社會行政人員 3 位、直接服務社工 7 位（平價住宅 3 位、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3 位、婦女中心 1 位）、民間基金會直接服務工作者 1 位及中央政策制訂者 1 位。

肆、脫離福利能否走出貧窮？

一、對貧窮的詮釋：貧窮非僅經濟匱乏，更有主觀等多元意涵，亦可人窮志不窮

受訪者及工作者對於貧窮的認知相近，均包含狹義—經濟層次及廣義—非經濟層次的意涵。換言之，貧窮不僅是法定貧窮、最低生活維持的需要，同時也可以有支持、精神、靈性貧窮、主觀貧窮、個人價值判斷，以及機會剝奪、知識貧窮等，是更多元的內涵。最後，論到貧窮自覺，個案出現物質匱乏、相對貧窮、精神志氣以及靈性空虛四種不同的態度，而客觀認知和主觀感受之間是有些許連結，但又不全然一致。物質貧窮與精神貧窮無必然關係，人窮，但亦可志不窮。

二、對脫貧的詮釋：脫貧不僅是脫離救助，還要可自足生活、有能力，認知影響自覺

綜合受訪個案及工作者對於脫貧的認知，大多數是從狹義的定義，即經濟層面，認為不僅是不再仰賴救助，也要可自足生活，能經濟穩定。具體來說，就是自己能

有存款、有房子，或至少能搬出平價住宅，才算脫貧。這與臺灣過去的研究對脫貧多定義為「脫離救助」不同，增加了還要「經濟自足」的重要內涵。此外，也有個案談論到廣義非經濟的層面，諸如心理上不再抱怨、靈性上代表一種內在生命的改變，文化上能擺脫貧窮文化；能力上代表自己擁有賺錢及生存能力的無形資產，以及主觀感受達到所欲水準等多元意涵。論到脫貧自覺，個案出現未脫貧反陷困、未脫貧

但有可能、已脫貧仍搖擺以及已脫貧且穩定四種不同感受，可見對脫貧的詮釋及生活現況，影響脫貧主觀感受，亦即客觀認知和主觀感受之間，是有明顯的關連。

三、貧窮與脫貧之間

進一步歸納受訪個案和工作者他們對於貧窮和脫貧的詮釋（表 1），發現兩者間有呼應的關聯。

表 1 貧窮與脫貧概念對照

概念	貧窮	脫貧
狹義	法定貧窮、經濟匱乏、難以維生	第一層：脫離救助 第二層：經濟穩定、自足生活
廣義	<p>非經濟多元意涵</p> <p>精神：沒志氣動力、缺乏智慧、看不起自己</p> <p>網絡：缺乏社會支持，無人可幫</p> <p>靈性：不認識神、認識自己</p> <p>主觀：事涉個人的價值判斷</p> <p>相對：機會剝奪、知識貧窮</p>	<p>非經濟多元意涵</p> <p>心理：突破障礙、不抱怨</p> <p>靈性：生命由內而外的改變</p> <p>文化：擺脫貧窮文化的影響</p> <p>能力：有能力、辦法可工作、賺錢、自立以及面對問題</p> <p>主觀：達到所欲水準</p>

首先，就向度來看，「貧窮」與「脫貧」都具有狹義經濟層次及廣義非經濟層次的意涵。就狹義層次看，具體指標上，進入法定貧窮範圍若為貧窮，脫離救助則可視為脫貧，基此，福利身份的轉換，擁有或喪失低收入戶資格，成為定義「貧窮」與「脫貧」最基本且明顯的指標。而在生活情形上，貧窮代表處於經濟匱乏、難以維生的處境，此與最低生活維持及絕對貧窮的意涵相近。相對地，當個人經濟穩定、可自足生活時就達脫貧的境地。

就廣義層次來看，兩概念同時具有非

經濟多元意涵，共同性涉及精神/心理、靈性、主觀等層面。就心理上來說，當個人沒志氣、看不起自己是謂貧窮，而當能夠突破障礙、不再抱怨，就是脫貧的提升。就主觀感受來看，有別於絕對貧窮，貧窮自覺事涉個人價值觀，而是否脫貧可自足生活，也和個人希望達到的生活水平有關，相對難界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廣義脫貧還有文化及能力的意涵。能擺脫貧窮文化、破解貧窮循環魔咒及刻板印象，以及培養個人有可攜式能力來因應生存、面對問題以達自立，是在除了離開救

助，可以自足生活外，對脫貧更廣闊的詮釋和期待。

最後，運用社會排斥的觀點來檢視受訪者對於貧窮與脫貧的詮釋。在他們的概念中，貧窮與脫貧都不僅只是經濟層次而已，還包含非經濟的多元意涵，正如 Townsend（1979）所言，貧窮不僅是基本需求，還包含社會性需求、社會參與等。以社會排斥理論的觀點，將貧窮看成不僅是經濟的不平等，更是一種多元面向的排斥而形成的社會弱勢。受訪者對貧窮的客觀認知和主觀與主流社會有分別的自覺，正正與他們所受的排斥原因有關。基此，用社會排斥理論，有助理解貧窮的不同面向。

四、脫離福利 vs. 走出貧窮

接下來要討論究竟脫離福利能否走出貧窮？這裡所謂的「脫離福利」，採取的是前述狹義脫貧的第一層次定義－脫離救助體系，而「走出貧窮」想探討的是可否達到狹義脫貧的第二層次定義－經濟穩定、可自足生活，以及廣義脫貧－非經濟多元層次的目標。

（一）脫離救助不一定經濟穩定

對於脫離福利能否走出貧窮，受訪個案及工作者多表示需視離開救助的原因而定。有個案表示，倘若是因經濟好轉自願離開，就代表脫貧；然而如果是因審核制度或是各種條件被強迫取消，就另當別論。

就個案及子女的觀察，每年自動離開救助的寥寥可數，幾乎都是因各類原因，

諸如孩子滿十八歲、父母資產增加等而被取消的，亦即是被迫遭制度排除的，而非自己經濟改善脫貧。換言之，取消救助，他們仍是辛苦過活、甚至反而陷入更為貧窮。就實際經驗，大部分受訪個案在離開救助後，對生活負面衝擊大，影響遍及經濟補助、就業及居住各層面。具體生活上，沒錢吃飯、就醫及就學。因而他們感受到壓力大，生活反從停留在救助體系的穩定，再次變成不穩定。

就工作者的觀察，從有低收入戶到沒有低收入戶資格的轉換，僅能定義他是離開公共扶助的範疇，不認同脫離救助可以等同於脫離貧窮，因為貧窮跟救助沒有等號。另外，沒有低收入戶資格也不代表他家就不再貧窮，仍要看他們是否能自足生活，若否，有可能他們仍陷苦難邊緣，屬於近貧家庭。

（二）脫離救助不一定達廣義脫貧目標

除經濟層次外，脫離救助之後是否可達到廣義脫貧非經濟層次的多元意涵？從受訪子女的觀點來看。如果遭註銷救助資格，但自己卻沒有能力可以穩定工作、存錢，仍然不算脫貧，換言之，脫離救助，不代表具備能力。

在心理層次上，雖有個案心存感恩和平靜，但也有些個案仍覺得恐慌、抱怨、只能認命。在主觀感受上，有些個案自覺脫貧，可拋開低收入戶身份，有更上一層樓之感；但也有些個案自覺未脫貧，生活仍搖擺艱辛。而在貧窮文化上，有些個案表示能搬離平價住宅，象徵自己能擺脫被

標籤，擺脫彷彿一直要窮下去的感覺。

(三) 脫離救助不等於脫離貧窮

立基研究發現，脫貧本身是個豐富的概念，從受訪個案及工作者的觀點，他們對於脫貧的定義，不僅有狹義脫貧—脫離救助、經濟穩定可自足生活兩個層次，還有非經濟層次廣義脫貧的多元意涵。換言之，他們對於脫貧的期待，是在脫離救助之後，不僅經濟能夠自立，在心理、文化、能力等方面也要有所增進。

然而，從訪談發現，脫離救助，不一定可以達到經濟穩定、自足生活；縱使達到自給自足了，也不必然具備相關的自立能力、在心理層次上能正向以對，甚至是主觀上認為自己已經脫貧。換言之，脫離救助、經濟穩定、非經濟廣義脫貧三者間，不一定存在絕對的必然關係，之間有一定的落差及存在多元的組合。

參考法國學者 Castel (2000) 從經濟性及社會性角度來探討社會排斥，筆者亦對臺灣社會救助制度在脫貧效果上提出兩個二元結構的維度。從結果論來看，運用經濟層面及非經濟層面兩面向，來檢視個

案能否自立，則可歸納出表 2 四種脫貧可能的類型。將這四類人分開，更能清楚去分析社會救助制度，它的排斥與反排斥的動力跟影響，是否真能幫助他們脫貧。在理論運用上，這也推進如何理解排斥的作用。

1. 重返貧窮

他們在經濟上無法自足，廣義心理上尚未預備好，亦未具可以自主生存的能力，離開救助，生活再次不穩定，極可能重返貧窮。

2. 心有餘力不足

此類個案心理上抱持正向思考，相信自己未來有可能脫貧，然而在經濟上還未能自立。

3. 有力心不安

此類個案現實經濟上雖可自立，但在心理上仍覺不安，不信自己有能力因應生活挑戰。

4. 穩健離開

此類個案經濟上可自立，心理上也自覺已脫貧，且信自己有能力因應生活，不會再重返救助。

表 2 脫貧四種可能類型

		經濟層面	
		不能自立	能自立
非經濟層面	不能自立	重返貧窮	有力心不安
	能自立	心有餘力不足	穩健離開

脫離福利不等於走出貧窮，還需經濟、心理自立，才能穩健離開

總結而言，受訪個案及工作者對脫貧的定義及目標，是同時包含經濟層次—脫離救助、經濟自立以及非經濟層次多元意

涵的。從研究意義，有別於臺灣多將脫貧定位為脫離救助，本次研究豐富了脫貧的概念，清楚釐清「脫離救助」與「脫離貧窮」在概念上的不同，有助於往後對話及因應策略的制訂。研究發現，脫離救助、經濟穩定、非經濟廣義脫貧三者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關係。當三者間出現落差時，實際上就可能出現重返貧窮、心有餘力不足、有力心不安及穩健離開四種可能的脫貧型態。基此，在回應脫離福利能否走出貧窮這個議題時，脫離福利僅可等於狹義底層定義的脫離救助體系，他們離開之後，無法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就『脫貧』了，仍須追蹤他們離開後的生活能否達到第二層次的經濟穩定、自足生活。如果不能，就需在經濟上給予協助，提供適當的緩衝。另外，在經濟層次外，也需關注他們在能力、心理、文化、主觀層次等廣義脫貧概念上的狀態如何，有無能力可以因應生活的挑戰，在心理上可正向面對未來，達到主觀所欲的生活。如果心理仍覺忐忑，相關的工作人員則需要陪他們一段，以增加安全感，相信自己是有能力面對未來的主體。

伍、社會救助制度的作用

一、制度定位：理想與現實落差

綜合來看，依福利歷程的三個階段，制度呈現的現象是，第一階段—進入前，窮人不一定能進入，進入者也並一定是窮人；第二階段—持續期間，放任不作爲、缺乏積極協助措施；第三階段—離開後，

脫離救助，不等於脫離貧窮。這樣的結果，首先，從理想性來看，無論是與社會救助法第一條「為照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受害者，並協助其自立，特制定本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3)的立法意旨，抑或工作者認為社會救助制度應是對有需要者作為社會安全網的期待，都有相當的落差。其中的原因，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進入救助體系的前後，需檢視的是制度是否存在排斥作用；而從第二階段體系內到第三階段離開後，則需關注制度是否能發揮協助脫貧的作用。

再者，以邏輯來看，嚴進—放任—寬出的思維，也與其他地區，諸如香港的綜援計劃有很大的不同。整體來看，綜援計畫雖也有入息及資產審查，然當申請人的實際總收入不足以應付認可的需要總額，計畫允許民眾有領取綜援的可能，只是針對那些失業或不完全就業的 15-60 歲身體健全人士，同步課以需加入自力更生支援計畫的義務(香港社會福利署, 2015)。換言之，香港的綜援計畫在進入救助體系的把關較臺灣寬鬆，採取讓申請人依實際需要即實際收入而非設算收入而先進入，在進入後，亦對申請人予以同步輔導、課予尋找工作或進行社區工作的義務，而非像臺灣在前端就予以嚴格審查、拒絕，假如民眾幸運進得來，就放任他們到不符合資格自動離開為止。

制度是融入或排斥，端視能否發揮為有需要者提供安全網的初衷

制度在「融入」與「排斥」的角色是

多變的，受訪者的共識，社會救助制度有「為有需要者提供安全網」的定位，如能發揮功能，制度就展現融入的角色；反之，若將其拒絕在外，則變為排斥者。然而排斥也不盡然都是負向的，基於公平正義的角度，如制度發揮該有鑑別力，能將不需要者拒絕在福利之外，制度的排斥作用似乎又是正向的。以結果論，在受訪者的觀點，現今制度未能讓有需要者都進入救助體系，又讓有些離開者是非自願性離開，顯見社會救助制度仍存在制度性排斥的可能。

以社會排斥理論，搭配貧窮動態來看受訪個案的生活，制度呈現「排斥、融入、排斥」的作用。只是制度「嚴進、放任、寬出」的思維設計，不但在進入與離開時容易推進制度的排斥作用，持續階段的放任不作爲，是制度與工作者在扶貧角色上的卸責，受助者雖然因福利提供得以階段性穩定生活，但缺乏脫貧的累積，不利將來穩健離開，亦易衍生未來再度被排斥的可能。值得深思，現行的思維邏輯是否合理，如果顛覆現況，採取「先進入，再輔導」，應有降低制度排斥作用的可能，只是這需有完善的配套措施作為支持。

二、制度的排斥作用：親屬責任、工作倫理

（一）親屬責任

檢視社會救助法歷次修法沿革，家庭應計算人口所代表的親屬責任，每每是各方討論及要求放寬的焦點。有工作者直

言，相較於貧窮線的認定方式，家庭計算人口才是影響民眾進入救助體系的關鍵因素，也應是與國外最大不同之處。

在執行上，親屬責任具體顯示於列計直系血親及兄弟姊妹兩個面向。就直系血親間互負扶養義務來看，多位受訪個案在申請進入前就有因列計父母而遭拒絕，或是因列計父母或出嫁子女等而被迫離開救助體系的經驗。受訪者反應，現實社會中，父母未必會對經濟困難子女伸出援手，而子女也無法要求父母協助。特別是對未婚生子、已出嫁、離婚的女兒等，礙於民情風俗，更難獲得原生家庭協助，處於更不利地位。相對地，對那些子女自顧不暇、失聯、不願扶養等的長者來說，硬性列計子女，不僅會排斥他們享受福利的機會，甚至會傷害親子關係。而就要列計同戶籍或共同生活的兄弟姊妹，有受訪者認為手足各有家庭，互不相干，納入不合理。

面對上述受訪個案及執行者的看法，中央及地方執掌社會救助的主管認為，相較於國外強調個人主義，華人社會親屬聯繫強，家人應是優先的求助對象，亦即家庭互助責任仍是社會的核心價值。另外，倘若僅豁免女兒的責任，亦違反性別平等的原則。而在強調家庭責任之際，制度已朝放寬方向調整，如法令中 539 條款的法定裁量權、排除列計旁系血親，都是鬆綁親屬責任的作法。因現行制度無力排除濫用福利者，且若真要破除家庭責任，則需連帶調整現行相關審核標準及人力，茲事體大。

可以說，親屬責任的設計，代表國家

責任與家庭責任之間的拉扯，仍期待社會救助扮演最後安全網的角色，應該是在家庭功能失效時才介入。然而，從上述救助定位的討論來看，現行制度並未能全然發揮讓有需要者進都能入體系的篩選功能，也不能確保離開體系者都已經沒有福利需要。親屬責任的強化，對那些因列計其他有資產但卻未能實際提供協助的家人，而無視自己家庭需要的人來說，已有制度性排斥及社會控制的意涵，讓國家在扶貧的協助角色外，又陷入排斥者的二重性角色困境。相對地，對那些因列計其他無資產但由手足分攤照顧責任的家人，可能會因列計人口增加而提升自己家庭得以進入救助體系的機會，造成另一種不公。換言之，若是制度設計無法避免會排斥以及讓非預期中的人進入，衡量的標準，是否該回歸到個別家庭或個人（如獨居老人）的「需要」或「權利」，而非以家庭「應該」發揮功能來考量。

借鏡國際，在東亞國家中，帶有儒家文化的家族式主義特色，對於國家與家庭在社會救助提供的角色上，起了影響的作用，怕國家介入太多會破壞傳統文化的家庭功能。臺灣對於親屬責任的強調，多少也反應了這樣的思維。然而，各地謹守的程度仍有不同。借鏡香港的綜援計畫，同是華人社會，香港對於親屬責任，卻不如臺灣的強調和僵化。綜援計畫允許個人提出申請，此時僅需計算個人的收入和開支；但申請人如與家人同住同食，便須要以住戶（家庭）為單位來提出申請，並會把所有家庭成員的每月收入和所需開支一

併計算（香港社會福利署，2015）。簡言之，還是回到申請者的實際居住及生活情形，而非像臺灣用制度安排，強將親屬責任加諸在未同住的家人身上。試問，難道香港政府就不怕這樣的安排會崩解家庭制度，促使港人選擇離開家庭自行獨居嗎？這其中的恐懼還有待商榷。簡言之，臺灣對於親屬責任的持續鬆綁，還是有空間的。至於無法防止福利濫用、詐騙福利等擔心，抑或因此增加的人力成本、需作相關標準的調整，似都應該放在制度作為照顧有需要者的安全網的大前提下來考量，才不至於因防弊而喪失制度存在的本意。

二、工作倫理

除了親屬責任，臺灣救助制度中另一特有的設計是工作收入的設算。多位工作者認同設算有理，應予維持。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主張天助自助者，不工作就沒有接受救助的正當性，不希望民眾捨棄就業而依賴福利。另外，他們表示這亦和臺灣興盛的地下經濟有關，為避免審核漏洞，收入設算仍是合理的。再者，研究也發現，在設算的標準上，幾次修法有逐步放寬的趨勢，亦給審核者有更大的彈性空間。工作者認為現行設算制度已很寬鬆，標準並不算高，具合理性；在效益上，能進入救助體系者增加、相對民眾的爭吵變少。

即使如此，對於工作倫理、設算制度仍有幾個議題需要關注。首先，設算收入若是行政機關因應地下經濟難查，又想維護工作倫理的預防措施，則需注意的是在這制度下誰被排斥？研究發現，因參與地

下經濟無法被課稅、但收入頗豐者可能因為收入的低算而進入救助體系，形成不公平現象。然而對那些家庭有經濟需要，但因就讀夜間部、或重考的子女、在家帶小孩的家庭主婦等來說，反倒可能因實質無所得、但被設算收入而被拒於福利之外，這不僅可能抹煞人力資本培育、照顧工作的價值，亦是另種不公義。另外，對於有工作能力的失業人士，也可能因設算收入自始被排除在福利之外，失去獲得短暫救助、接受服務的機會。基此，當行政上的方便、權宜之計恐造成對象之間的不公及排斥現象，是否該重新檢視回歸實際收入的可行性？

再者，工作倫理的本意是期待有工作能力者就當優先去工作，應有鼓勵工作之意，然而透過制度執行後，受訪個案及孩子卻指責產生抑制工作動機的反效果。諸如孩子有心打工、半工半讀，因收入增加，卻導致喪失低收入資格的下場，似成變相懲罰。他們若仍需留在救助體系，只能停止打工或尋找不需報稅的工作。對此，他們批評政府制度不合邏輯。有受訪個案就說「要〔做〕低收入戶，就得懶惰一點」（個案 J）、「是制度要人只能領錢不能工作」（個案 B 之子），工作者也說「民眾擔心動輒得咎，或許不作為反而是最好的作為」（W13）。如此看來，若真有福利養懶人，制度設計恐也難辭其咎。

最後，與西方國家以工作換取福利（workfare）的概念相似，1997 年社會救助法在第十五條就有不接受就業輔導就不予扶助的規定。姑且不論其是否恰當，單

就執行上，受訪工作者表示因為民代壓力、缺乏後續配套，及擔心後續行政救濟的問題，故無人敢開鋤，更遑論大規模的運用。換言之，對那些不接受就業輔導者，卻無法落實不予救助的規定，法律形同虛設，有損政府公信。

同樣借鏡香港，雖然綜援計畫在資格審查時採實際收入相對寬鬆的標準，但為落實工作倫理，對身體健全的 15 至 60 歲失業或不完全就業人士，則訂有加入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義務。一旦違反承諾，政府有權停止處理他的申請案，終止向他及其家庭繼續發放綜援金（香港社會福利署，2015）。此設計和臺灣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不接受就業輔導就不予扶助的規定有異曲同工之妙。差別在於，如果香港能夠執行，臺灣為何不能？至少可借鏡的是，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提供受助者更多協助就業的配套，在祭出棍子之際，同時也要端出輔導的胡蘿蔔，軟硬兼施下，才較有強制執行的正當性。

親屬責任及工作倫理，欲融入，反排斥

綜合來看，親屬責任及工作倫理是目前救助制度執行的兩大困境，也是歷次修法攻防的焦點。過往臺灣有兩篇論到親屬責任或工作倫理帶來的制度性排斥，有助於理解制度是如何及透過誰來產生排斥。但對於國家為何發動排斥及整體制度的檢視，則相對闕如。

本次研究進一步細究立法的初衷，發現制度的立意是「要融入」，而「非排斥」。國家原欲透過親屬責任來維繫家庭支持的

功能，並鼓勵民眾就業達到經濟自立及融入社會的目的。熟料執行後，極端地卻造成妻離子散、不就業以得福利的反效果，將個人排斥於家庭、社會關係及勞動市場之外。以過程論檢視，如果最初「立意良善」，至終「結果走樣」，探究原因則可能是「過程手段」出了問題。列計人口及設算收入等的安排及執行者的操作，或是造成制度從原本欲融入，到結果反排斥的因素。那麼，後續要討論的不僅是該不該強調親屬責任和工作倫理，而是更務實地制度該如何操作安排、執行者該有怎樣的角色和協助，才能發揮制度要協助有需要者進入安全網的融入初衷。

三、制度的脫貧作用：協助穩定，無助脫貧

(一)持續階段：穩定生活

研究發現，當受訪個案取得低收入戶資格後，他們從救助體系獲得了生活、醫療、健保等各類補助，連帶還有擔任代賑工、居住平價住宅、參加脫貧方案的資格。此外，他們也從民間取得不少的福利項目。有工作者更生動形容低收入戶卡是「全家福卡、金卡、貴賓卡」，一卡在身，福利無限。

整體來看，大部分受訪個案肯定制度對他們具有減輕經濟負擔、穩定就業和居住，以及維持子女受教權的效果。與進入體系前的居無定所、得縮衣節食的不穩定性相較，進入後各項福利對他們的生活的確發生穩定作用，至少讓他們能獲得喘息

的機會，從不穩定的狀態邁向穩定。可以說，救助體系提供多面向補助和機會，可以穩定生活，有利受助人融入社會。

(二)持續到離開：自求多福缺乏服務

1.制度：徒有願望，無助脫貧

首先，論到制度的脫貧作用，先從法規來檢視，社會救助法第一條立法目的時宣示：「要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自立」；第十五條對受生活扶助者具工作能力之脫貧措施中明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提供或轉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相關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以工代賑。...於一定期間及額度內因就業而增加之收入，得免計入...家庭總收入，最長以三年為限，經評估有必要者，得延長一年。」（全國法規資料庫，2013），顯見它有協助受助者脫離救助的願望，而脫貧的重要管道是透過就業，因而有豁免入息的鼓勵機制。

然而，落實到執行面，受訪個案和工作者，幾乎都對制度的脫貧作用持否定的看法。就個案的體驗，有個案明言救助制度幫助生活穩定，但無法協助他脫貧；另有些個案坦承在理性計算後，未免因小失大，會抑制脫貧動機，費心想各種理由續留在救助體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受訪者提及，若是給他們收入豁免緩衝期，所賺的錢得不算入收入，他們就願意努力去賺，可見緩衝期機制的設立，對提升工作者的工作意願、乃至累積未來脫貧的資本是有助益的。令人不解的是這樣的機制 2010 年修法時法規不是已經明訂了

嗎？幾位受訪個案的反應是，並不清楚有此規定。可見資訊的落差，宣導不力或未確實執行，恐也會損及立法的美意。

從工作者的角度，多數亦認為制度無助低收入戶脫貧，相當程度仍有賴個人的造化，是否懂得把握機會，好好求學、存錢。而制度上僅單純給錢可以協助維持生活，但因努力多賺反而喪失資格、缺乏配套措施可觸動受助者改變等設計，亦都無助脫貧。

綜合來看，當還期待個人自求多福、自然脫貧時，制度及工作者就顯得相對被動，缺乏積極協助的作為。甚至制度透過設算收入、列計就學子女的打工收入等安排，不僅沒有鼓勵、支持個案透過自己去脫貧之意、更可能反倒產生抑制脫貧的反效果，與原創協助自立的初衷，背道而馳。

另外，有幾位工作者相對肯定制度至少能扶持低收入戶子女平安長大，使家庭有脫貧的可能。前面已經討論，靠子女脫貧，是可以想像，但並非必然，仍需要子女能夠穩定就業及願意回饋兩個前提，而這有賴個人、家庭、工作者及整體大環境的共同努力。反觀現實狀況，工作者未將已進入救助體系的低收入戶當作主要服務個案，連帶也缺乏陪伴、主動關懷等非現金的協助。在任由個別家庭自求多福、自行闖蕩時，制度扶持子女長大，嚴格來看，頂多被動地發揮維持家庭穩定的功能，但不必然可以積極地帶來日後脫貧的效果。

2. 方案：杯水車薪，作用有限

再者，從制度安排落實到具體的措施，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之一為協助低收

入戶脫貧措施明訂：「主管機關為協助低收入戶積極自立，得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辦理脫離貧窮相關措施。參與前項措施之低收入戶，於一定期間及額度內因措施所增加之收入及存款，得免計入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最長以三年為限，經評估有必要者，得延長一年。」（全國法規資料庫，2013）。此為各類的脫貧方案奠定法源和豁免計入的基礎。

就臺北市的經驗，從 2000 年全國首創家庭發展帳戶以來，廣續推出各式資產累積、就業自立等脫貧方案，就工作者看來，項目原意佳，然而項目受惠者有限。就實際參與者的看法，大體認為有助於人力及物質資本的提升、延長低收入戶資格等正面效益，但亦有得應付方案規定，甚至淪於獎學金性質的負向看法。而就其他受助者的看法，認為協助有限。尤其對政府在創業及就業的協助，偏向負面評價。有個案覺得政府沒有協助他們如何去找工作、有些則認為政府提供的是沒尊嚴、短期低薪的工作，更嚴重者，認為創業貸款恐陷他們於更大的財務危機。換言之，相較於就業自立方案，資產累積方案的肯定度相對較高，然而在人力物質資本的累積及延長停留在救助體系助益，和實際能協助脫貧仍有不同。無論如何，對照龐大受助者，僅能有小眾受益，顯得杯水車薪，脫貧作用有限。

3. 缺乏離開前的轉銜服務

最後，聚焦到即將離開前夕的轉銜服務，以結束家外安置的兒童及少年為例，政府明確規定工作者在結束前三個月開始

介入，俾利規劃協助返家或自立生活的服務，並至少需要後續追蹤輔導一年的機制（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亦即期盼透過工作者有計畫的陪伴和追蹤，能夠協助離開安置的兒童或少年，能順利過渡到返家或自立的生活。反觀社會救助法，前已提及雖在第十四條訂有：「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派員訪視、關懷受生活扶助者之生活情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導。」（全國法規資料庫，2013），然而工作者平時並未將協助、輔導低收入戶作為主要工作內容，在受助者要離開前夕，也缺乏相關的轉銜服務。一旦當制度與工作者卸責，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及工作者的陪伴，脫貧的責任就易轉嫁回個別家庭本身，此時要求他們自然脫貧，抑或苛責他們福利依賴，都顯為不當、亦不公允。

（三）離開階段：缺乏支持和緩衝

從貧窮動態的觀點，進入、持續到離開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然而對照到制度的作用，並不是無縫接軌。首先，在對象上，制度所關心的對象是仍在救助體系中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這可見於定期的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中，離開者並非調查的對象。再者，在服務設計上，社會救助法第十四條雖新增：「對停止扶助者，應主動評估其需求，協助申請其他相關福利補助或津貼，並得視需要提供或轉介相關就業服務」（全國法規資料庫，2013）。然而，在時間點上，是在離開後才啟動評估機制，而非提前到離開前就開始轉銜，錯失

先機。另外，相較於離開安置的兒童或少年，有明確的執行規劃及持續一年的追蹤，現行社工多僅為單一次的經濟或物質協助，工作重點在於協助申覆低收、轉介其他福利民捐，仍是相當經濟取向，以協助他們重返低收入戶為首要工作，並沒有協助他們脫貧的願望和功能。最後，在福利項目上，2010年社會救助法修法雖新增了中低收入戶，然而對受訪個案而言，它無法完全替代低收入戶的項目與給付額度，緩衝的功能有限。過大的福利落差，除恐讓仍在救助體系內的家戶望之卻步，亦容易讓甫離開救助者，從穩定一夕陷入搖擺，甚至重返貧窮。

對照受訪個案在離開救助後的生活經驗，大體呈現向上提升及再度不穩定兩種樣態。對那些生活趨於穩定的個案而言，明顯可見他們對於能夠離開救助體系、搬離平價住宅，回到常人水平，心情是雀躍的，對自我形象亦大大提升。許多人明確表示自己不會再重返救助。由此可見，當受助者有機會、有條件可以離開時，他們是願意離開，不會因為低收入戶套餐式的福利而裹足不前。福利依賴的指控，對他們並不適用。

需要被關注的，是那些離開後，生活瞬間陷入搖擺、不穩定者。研究發現，這群人常會運用各種手段以重返救助體系為目標，工作者或為便宜行事，最快速、簡易的作法，就是順應個案的期待，配合協助他們再重返救助體系。然而，這是短暫治標，但卻不治本，甚至反易種下惡果的作法。

倘若制度仍然缺乏協助脫貧的配套，這僅是落入另一個福利循環，將脫貧的難題往後延伸而已。不免令人擔憂，相較於從未離開過救助的人，這群人經歷過短暫失去福利對生活產生的震盪，對於他們未來的脫貧之路，到底是助益或是阻力？是會讓他們更儘早預備，抑或更想盡辦法要留在救助內？為何不能在他們離開後搖擺之際，針對他們的需要給予多一點的支持和緩衝（例如等孩子完成學業），培力他們能夠更穩健地度過喪失安全網的陣痛，而是要五毛給一塊的，將他們推回全有的救助體系？在歸咎於是個案的福利依賴時，更要同步去檢視制度安排從目標到現實間的落差和錯置，而工作者的缺席和服務缺口，亦難辭其責。

制度穩定生活有助融入，缺乏脫貧措施，易再造成排斥

整體而言，與進入救助前的不穩定相較，受訪者肯定在救助的持續階段，制度將他們的生活帶入穩定，發揮了維持家庭與社會穩定的功能，亦對受助家庭有融入的效果。然而就脫貧作用而言，因為制度設計的錯置和限制，不僅沒有積極協助家戶脫貧的作用，反倒還可能造成抑制脫貧的反效果。而推行多年的各類脫貧方案，規模有限，雖然可產生協助資產累積的部分作用，但和真正能助脫貧，仍有差距。另外，制度缺乏離開救助前的專特轉銜服務，也讓社會救助法開宗明義協助民眾自立的精神，顯得空泛。家戶若要脫貧，仍有賴自求多福。最後，在離開階段，因離

開者非社會救助法關切的對象，缺乏後續的深度服務，也缺乏專特的緩衝期和足以協助過渡的福利項目。可以說，制度對於即將或已離開者，並無協助脫貧的願望和功能，因缺乏協助措施，使制度對於那些離開後生活搖擺不定的人而言，易造成再度排斥的作用。此時，制度及工作者該作的，不是便宜行事協助他們重返救助，而是在制度安排上多一點緩衝和經濟支持，工作者給予陪伴和培力，助其度過離開安全網的陣痛。

陸、代結論：對社會救助制度的建議

一、發揮安全網初衷，以脫離貧窮取代脫離救助

綜合相關法規、文獻，以及受訪者的觀點，都認同社會救助制度在定位上，應扮演最後安全網的「安貧」角色，讓有需要者都能進入體系，以維持基本生活。然而從臺灣偏低的貧窮率、放寬標準後進入救助體系的人不如預期的多，以及研究發現，窮人不等於低收入戶，可見，進不來救助體系的窮人仍有人在，這群弱勢中的弱勢，受到福利排斥，不符合公平正義。在檢討制度的安排及運作前，應先回到政策定位的初衷，確實為有需要者發揮安全網的功能，展現制度融入的角色。

再者，應先釐清制度的政策性目標，究竟僅是要「脫離救助」，還是要「脫離貧窮」？受訪個案對於脫貧的想望，是要脫離貧窮，而非僅脫離救助。然而對照制度

及工作者的觀點，關注福利資格的審查，缺乏扶貧措施，可見仍著力於進入及脫離救助。基此，國家對於「脫貧」的政策性目標，應要能回應使用者的期待，以脫離貧窮取代脫離救助，而當政策目標改變時，後續將採取的具體措施也需隨之調整。

二、寬進、培力、緩衝三部曲，搭配安貧、抗貧、扶貧、脫貧四重奏

以貧窮歷程檢視，目前社會救助制度的運作機制呈現「嚴進、放任、寬出」的思維，雖能發揮穩定生活的作用，但無助積極脫貧。建議應改變政策的思維，轉成「寬進、培力、緩衝」。首先，進入社會救助體系的審核應採取「寬進」原則，破除因親屬責任和工作倫理造成的排斥，回歸申請者個別的需求，讓有需要者能有階段性取得福利，以維持生活的機會，擴大制度融入的可能。其次，持續期間，提供經濟補助外，政府應提供普及式的扶貧措施，而工作者應致力於培力的服務，協助低收入戶家庭建立人力及社會資本，強化各面向的融入。最後，脫離階段，有別於現行政府在發出不符合資格公函時，就令低收入戶「即刻脫貧」，制度應有「緩衝」機制，包含離開前的預告，以及離開後階段性依個別需求，提供同額福利補助的緩衝。亦即，當低收入戶家庭是在有準備、有協助的情況下，來度過福利資格的轉換，他們脫貧的歷程及感受將更為正向，離開後的步伐也會更為穩健，減少重返貧窮，再度被排斥的風險。

再者，從服務策略檢視，當制度發揮

安全網的角色，讓有需要的人能進入社會救助體系時，基本展現「安貧」的功能。但扣緊「脫離貧窮」的政策性目標，制度在階段性目標上，應該進一步發揮「抗貧」、「扶貧」及「脫貧」的功能。臺北市府社會局於「首都掃貧運動」(1997-98)期間，推出「安貧、抗貧、脫貧」的社會救助總政策(臺北市府社會局，1997)。其貢獻是從不同的權益角度，指出協助窮人有不同的階段目標和策略，美中不足的是，該觀點未凸顯政府及工作者在扶貧上的角色，而且要脫離貧窮，也不能僅賴財產的形成。基此，研究者建議政府的服務策略應為四部曲：「安貧」、「抗貧」、「扶貧」及「脫貧」。

「安貧」旨在為所有落入貧窮的人，透過經濟補助、醫療等提供基本生活的維持，展現安全網的功能；「抗貧」意在透過就業服務、教育投資等，讓低收入戶家庭除了基本維持外，也開始有累積的可能，至少不至於更為貧窮，提供止跌回升的基礎；「扶貧」則賦予政府和工作者對受助者有更積極的協助角色，採取經濟(in cash)與服務(in kind)並重的策略，強有力的陪他們走一段，協助他們找到自己的意義和方向。讓他們不只有工作就好，而是能找到體面、足夠養家的工作；不只有就學就好，還要能順利就業；在親子之間，也要有好的連結，才能夠透過兩代協力脫貧。當低收入戶成員有能力累積有形的財產、無形的能力和資本，在主觀上預備好時，才能達到「脫貧」的終極目標。

應用到低收入戶成員，政府應針對不

同的服務對象，分級分類設定不同的服務策略。例如，對於獨居老人、無工作能力的身心障礙者，政府要有長期協助安貧的承諾；對家有年幼子女的家庭，願意中長期投資教育，以利人力資本的累積；對不完全就業甚至未就業者，能協助就業，獲取實質的收入，得以抗貧；對已穩定就業、就學、家庭即將新增工作人口等脫貧機會更高的家庭，給予扶貧培力和協助，提升已就業者就業的類型、技術和收入，協助即將畢業者順利穩定就業；對即將及甫離開救助的家庭，給予預備和緩衝期，以利長遠脫離貧窮。

三、鬆綁親屬責任實質維繫家庭，擴大豁免入息適用對象

研究發現，「親屬責任」及「工作倫理」的安排，是產生制度性排斥的主因，尤以前者為甚。國家與家庭在窮人照顧責任的拉鋸戰上，對於鬆綁親屬責任的裹足不前，主要是深怕一旦國家作多，反而會害傳統的家庭價值崩解。然而，事實果真如此？試想，對於陷入貧窮的家庭，若國家沒有適時伸出援手，給予階段性基本生活的維持，而是強行要求他去求助不可得的親屬協助時，可能的結果是父母為了餬口難以兼顧子女照顧、導致疏忽、高風險；子女為打工荒廢/放棄學業、甚至因家貧棄家而去；為了虛擬的親屬責任導致家人反目成仇、失聯。甚至為生存非取得低收入戶不可時，離婚、出養等匪夷所思的策略都因應而出。上述後果，反而破壞家庭的維繫和功能，也不利家庭資本的累積，明

顯與國家想要透過親屬責任來鞏固家庭的初衷，反而背道而馳。

反向思考，當家庭陷入貧窮，國家更願意勇於承擔，回歸個別家庭的實際需要，鬆綁親屬互負扶養義務的虛擬責任時，他們才有機會進入社會救助體系，獲得階段性的穩定生活。在「安貧」之餘，家庭獲得基本的維繫、免除分崩離析之虞；家庭成員在喘息中，才有機會透過就業與就學等，逐步累積能量來「抗貧」；加上政府有力的「扶貧」與社工陪伴，與低收入戶個人和家庭工作，在穩健中向上提升和累積，才有機會最後能穩定的「脫貧」，不至於重返貧窮。綜合來說，國家在進入救助體系前對於親屬責任的鬆綁，不是替代家庭、令家庭崩解，反而是因社會救助的協助，實質維繫了家庭的完整，令在喘息中的家庭成員能有更好的連結和累積，代間協力加強家庭中的連結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成為日後可以脫離貧窮的基礎，反過來能穩健家庭傳統發揮的功能。

與親屬責任「名為維繫，實質破壞」家庭相似，工作倫理的安排，打著「推銷工作」之名，卻落得「壓抑工作」之實。當大多數低收入戶都有工作的事實和動機時，卻因制度「多賺反而因小失大」的不當設計，迫使他們放棄工作或轉向地下經濟，委身救助，形成政府及低收入戶家庭雙輸的局面。另外，雖然社會救助法修法後新增豁免入息及參加脫貧方案者得以緩衝的規定，但這些能夠受惠的畢竟是小眾，對那些廣大靠自己或非正式資源找到

工作，以及未參加脫貧方案者而言，豁免入息/財產的緩衝美意，形同虛設。既要鼓勵工作和資產累積，何妨創造普及式的扶貧措施，擴大豁免入息的適用對象為全體低收入戶成員。當人人有分，鼓勵工作的誘因才能落實，低收入戶成員也才能無所顧忌的努力工作、儲蓄，為未來的離開累積能量，達到長遠脫離貧窮的目標。而這

對國家制度、工作者以及低收入戶家庭，才是三贏的局面。

（本文作者為現任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科长，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福利哲學博士）

關鍵詞：貧窮 (poverty)、脫貧 (escape from poverty)、社會救助制度 (social assistance institutions)

📖 參考文獻

- 王仕圖 (2001)。貧窮持續時間與在進入的動態分析：以 1990-1998 看嘉義縣低收入戶為例 (博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 王崧任 (2011)。青年脫貧歷程之研究－以高雄地區參與教育投資方案之青年為例 (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099NPUS5201005)
- 王德睦、王仕圖、蔡勇美 (2000)。貧窮的動態：嘉義縣貧戶的追蹤研究。人口學刊，21，61-75。
- 林正達 (2005)。貧窮動態－以嘉義家庭扶助中心扶助個案為例 (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093NHU05698038)
- 周大堯 (2006)。脫貧婦女復原力建構歷程之初探 (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094FJU00201007)
- 周麗芳 (2003)。貧窮線界定與社會福利政策相關措施之研究。內政部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市：內政部。
- 香港社會福利署 (2015)。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取自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comprehens/
- 孫健忠 (2000)。社會救助制度的新思考。社區發展季刊，91，240-251。
- 孫康華 (1998)。嘉義縣貧戶比例機轉模式分析：1989 年至 1996 年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嘉義縣。
- 陳正峰 (1998)。貧窮的落入、持續與脫離：以嘉義縣低收入戶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嘉義縣。
- 黃洪 (2013)。「無窮」的盼望：香港貧窮問題探析。香港：中華書局。
- 蔡晴晴 (2002)。單親家庭貧窮歷程之研究：以台中縣家扶中心受扶助家庭為例 (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090NCNU0210001)

- 詹三源（2009）。母改嫁有錢兒低收入戶沒了。聯合報，2009年3月3日。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997）。首都掃貧運動計畫。臺北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鄭淑文（2006）。從家庭生命歷程分析貧窮動態：以嘉義家庭扶助中心經濟扶助個案為例（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094CCU05206016）。
- 蘇淑貞（1997）。貧窮的歷程：以嘉義縣低收入戶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嘉義縣。
- Bane, M. J., & Ellwood, D. T.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1), 1-23.
- Bradshaw, J. (1972). A taxonomy of social need. In G. McLachlan (Ed.), *Problems and progress in medical care* Seventh Series (pp.69-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 R. (2000). The roads to disaffiliation: Insecure work and vulnerable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4(3), 519-535.
- Sen, A. (1983). Poor, relatively speak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5(2), 153-169.
-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London: Penguin.